



资本家发家真相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資 本 家 发 家 真 相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1 9 6 6 年

資本家發家真相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(上海紹興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字数 55,000
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-100,000

統一書号：11074·364 定价：(六)0.22元

插图：范一辛 封面：冒怀芬

目 录

如此“实业救国”.....	1
“米蛀虫”的花招.....	12
看“文明”资本家的真面目.....	21
在“国货救国”的幌子下.....	40
用工人血汗筑成的“安乐宫”.....	50
一家纱厂老板的剥削手段.....	62
“大滑头”的四十年剥削史.....	74

如此“实业救国”

許多人知道上海有一家以生产和銷售毛巾被单——三角牌毛巾和三友被单而名聞全国的三友实业社。三友实业社資本家打着所謂“实业救国”的旗号，也曾“参加”抵制日貨运动，一向标榜“做国貨起家”，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經常大登广告，宣称“商人爱国决不后人”，广事吹嘘。对职工又自称“公仆”，以一副“开明”面目出现。現在我們且来揭开他們的底細，看看三友实业社資本家的廬山真面目。

国貨起家还是依靠洋人、剝削工人起家？

讲到三友实业社的起家，还应该从洋烛談起。大家知道，在帝国主义对我国商品傾銷中，洋烛也是重要商品之一。一九一〇年前后，进口的洋蜡每年要达到一百万关两左右。英商亞細亞与美商美孚两大国际石油壟断資本，以石油副产品石蜡在中国設厂制造的白礼氏、僧帽、鷹牌等洋烛，完全壟断了我国的洋烛市场。

一九一二年，上海烟兌业有两个小业主和一个商店伙計，从业务接触中，看到洋人做洋烛生意很能賺錢，就非常眼紅。他們經過了一番研究后，觉得做洋烛芯子是一条生財之道。于

是由一人发起，两人附和，集資三百元，在横浜桥南堍租了一間房子，雇些工人，开起烛芯手工作坊来。因为是三个人合資開設的，而那时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“实业救国”論正很时髦，所以就取名为“三友实业社”。

从此，他們就喝着工人的鮮血撑起“家业”来了。

当时每磅烛芯售价零点九六元，除去原料、工人工資及其它費用，每磅烛芯的利潤是零点三八元，利潤率达百分之四十左右。工人們每人每天只拿一角多点工資，而劳动時間却长达十四、五小时，从天蒙蒙亮开始，一直做到夜里九、十点钟，每人每天平均可生产烛芯一磅，剝削率高达百分之三百八十。他們使用的是費力的木制手搖烛芯车，不少人整天蹲在一間不大的房子里，夏天象只大火炉，热得透不过气来，渾身汗水湿透，冷天冷得象冰窟，手脚冻僵。两个資本家每天輪流在旁監工，工人除吃飯、大小便外，不准停一停。

三友实业社資本家为了发财，明里叫嚷“爱国”呀、“实业救国”呀，暗里却拼命巴結洋人。当时，美帝国主义的美孚洋行和英帝国主义的白礼氏洋行，是上海烛芯市场的大主顾，三友实业社資本家为了博取洋行的“信任”，一心投靠它們，其中，美孚洋行大班除向三友实业社大笔定貨外，还透支資金給予扩大生产。三友实业社的烛芯原料是使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棉紗，又裹在英、美帝国主义傾銷的洋烛里，不断扩大了銷售。資本家就是这样，在为帝国主义服务中吮吸工人群众的汗血发了財。一九一七年，他們靠着这笔罪恶錢在引翔港购地三十多亩，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工厂。生产品除烛芯外，也开始增加了

毛巾、被单等其它棉織物。

为了获取巨額利潤，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，三友实业社这时候雇佣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这些劳动力的来源有二：一是农村里的破产农民，一是童工。

在引翔港設厂生产毛巾之初，資本家以照顾同乡为名，亲自去安徽合肥招来大批破产农民。招工的条件异常苛刻，每天两班生产，每班工作十一小时半，平时这些同乡工人被厂里三道鉄门关牢不准出厂，并规定“亲友不得来厂探望”。引翔港厂后来以生产三友被单为主，以畅销的六尺全幅被单为例，每条售价三元六角，原料及漂染等費用二元四角，工資仅約三角，資本家在每条被单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达九角，剝削率也高达百分之三百。

在童工的尸骨堆中造起他們的“天堂”

三友实业社資本家雇佣童工，則又是以“貧童救济者”的面目出现。他們曾在上海机制国貨工厂联合会一次会务报告中，大声疾呼地說：“吾人如何救济无力就学而急需謀生之十二岁儿童？”儼然一副“慈善家”的面孔。这当然也是一套残酷榨取廉价劳动力的騙人手段。他們知道，大工厂需要大量工人，而童工的工資最为低廉，做搖紗等工种，工作量可以抵得上一个成年工。精明的三友实业社資本家就打定主意，凡童工可以做的工作，一律使用童工。当时，厂里童工最多时曾达五百多人，占全厂工人总数的一半左右。搖紗女工每日工資四角五分，童工只要二角左右，而他們的工作量却不相上下。

三友实业社資本家仅雇佣童工一項，每年就能够多剝削四、五万銀元。

这些童工都是由工头从泰兴、海门、合肥等外地农村里招来的。最多一次招了二、三百名。童工一般只有十二、三岁，身材矮小的还没有机器高。他們一进三友实业社的大鉄门，就終年关在里面，听任資本家宰割。童工进厂第一年，每天工資一角八分，扣去伙食費一角二分，每天只有六分錢，每月淨得一元七、八角，只勉强供鞋袜、理发之用。以后虽然可以稍微加一点，但厂方规定童工工資至多不得超过每天二角四分，童工們除了生活必需費用外，每月所剩就很可怜了。这些童工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时以上，并且还规定了每天要搖五十大板紆子(每板五十个)的工作定額，如果到下工时还做不満足額，工头就强迫童工跪下来毒打五十板子。第二天还得忍着肿痛上工，不給休息。

童工吃的尽是臭咸菜、酱油湯、黄糙米飯。他們住的工房，挤得象“鴉鴿籠”一般，一間二十平方公尺的小房子，塞滿十架床，每架三层，每层睡两人。毛竹涂石灰的房子挡不住风雨，一陣大雨之后，滿地泥淖。到了夏天，臭虫、蚊子、蒼蝇肆虐，室内臭气冲鼻。

多少童工在过度劳动的血腥榨取中，丧失了生命！据有关老职工回忆，三友实业社童工死亡事故是經常发生的，仅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五年間，就死去一百多名！資本家就在童工尸骨堆中捞取大量利潤，建造起他們的“天堂”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。



童工住的工房，挤得象“鴿籠”一般。

开办农村毛巾工场的剝削门槛

三友实业社資本家曾經吹嘘說：在市郊办織毛巾工場，“使几千农民获得了工作机会”。实际上資本家的门槛精透，他們盘算在农村設厂織毛巾，可以把工資水平再压低百分之四十以上。因此，他們就压缩引翔港厂的毛巾織造，改在川沙、嘉定两县农村設立十多处工場，总共雇佣农村女工达两千多人，大量制造毛巾。她們使用的是极为簡陋的木机。操作全凭人力，手拉脚踏，劳动强度很高，而工資却低得惊人。一般女工每織一条毛巾的报酬不到一分錢！

这时，三友实业社資本家已經购置了两台織毛巾的电力鉄机，鉄机比木机的劳动生产率是3:1，但是投資却是30:1。在农村工資极其低廉的情况下，資本家算盘一打，认为在农村用木机生产要“合算”得多，因此他們把电力鉄机束之高閣，而用两千架木机剝削农村女工廉价劳动力，达十余年之久。

拿織三号毛巾來說，在抗战前，每一織毛巾农村女工，在半个月內生产量如超过五百条，每打才可得工資一角七分，能够超过五百条的，自然只是少数；而每半个月織二百五十条的多数农村女工，每打工資只能压低到拿一角一分半；假使不满二百五十条的，則每打工資只能拿一角零八厘。我們可以从下表來說明：

单位：元

每一女工半月生产量	每打工資	工业資本家每打純利潤	剝削率
500 条以上	0.17	0.36	212%
250 条以上	0.115	0.415	361%
250 条以下	0.108	0.422	391%

由此可见，織得越少，农村女工所得的工資越低，資本家利潤相应提高，剝削率也越高。但是三友实业社資本家的另一目的，是要刺激生产，我們再以每一个农村女工每半个月的不同生产量，来看資本家剝削剩余价值的总量：

单位：元

每一女工半月生产量	折合打数	每打利潤	利潤总量
500 条以上	41.66 打	0.36	15.00
250 条以上	20.83 打	0.415	8.65
200 条(平均計)	16.66 打	0.422	7.03

这里可以說明，农村女工織得越多，資本家剝削所得的总利潤量也越大。半个月內織滿五百条的农村女工，給資本家剝削去的剩余价值最多，达十五元。因此，三友实业社資本家实行等級工資制，是“一箭双雕”的毒計。一方面把織得少的农村女工資尽量压低，加强剝削；另一方面刺激他們拼命生产。这是資本家在表面上实行所謂“超額獎”的秘密所在。这样的“血汗工資制”，是作为一根无形的鞭子，来鞭策农村女工为他們拼命干活，从中榨取惊人的利潤。

我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剩余价值的实质。他們剝削工人是千方百計和无孔不入的，他們施用各种手段压榨厂內工人、童工和农村女工，进行最大限度的榨取。

三友实业社从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为雇工几千人、发行所遍設全国各地的大企业。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二十年間，它的資本額从三百元激增到二百万元，即增加六千六百多倍。

表面上“抵制日貨”、暗中經營日貨

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以后的历次爱国抵制外貨运动，却成为三友实业社資本家发财的好机会。他們装出一副“爱国”面貌，大声疾呼：“抵制日貨，提倡国貨，万众一心，誓雪国耻。”同时，在报纸上大登广告：“請用国貨三角牌毛巾！”三角牌毛巾銷路大旺。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他們就在各大报上刊登了全版封面广告，写一个碗口大的“哭”字，下面小字注有“南京路枪杀学生”字样，还附加“尔愿作冷血之动物乎？抑愿作热血之人类乎？”“冷血着毛絲綸（日本貨），热血着自由布”。三友实业社生产的自由布的銷路，于此又打开了。

但就是这个滿口“爱国”、“热血”的三友实业社資本家，为了发财，暗地里却大量地經營着日貨，利用当时广大群众的爱国心理，大发横财。正当“五四”以后抵制日貨运动高涨的时候，三友实业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供不应求，日本洋行的鉄錨牌毛巾大量积压，他們就暗中购进大量日本的鉄錨牌毛巾，指使亲信用药水把鉄錨商标揩掉，經過漂洗，打上三角印志，作为“国貨”銷出去，給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大大地开了后门。

他們还乘抵制日貨运动开展、日本紗价猛跌的当口，暗日向日商伊藤、日信洋行按一千件、二千件地大量购进日紗，生怕工人发现，預先勾結日商洋行买进的是无牌紗；或由专人連夜撕去日商商标，冒称国产紗。当时日本紗比国产紗要便宜一、二成，他們投机套购，也大大地捞了一笔。

更阴险的是，当他们看到工人爱国热情高涨，就借口要和日本货进行“工战”来加强剥削，落个“名利双收”。为此，他们在厂里特设一个警梆，每天黎明集合工人，击梆五十九响，工头领头高呼“你们有没有忘记五月九日国耻？”在门市部，资本家发给每个职员一个臂章，上写“我的工作战胜日本”。“爱国”的招牌也成了他们剥削的一种手段。他们还实行“生产奖励”办法，拿“金质奖章”发给出品质量好、数量多的工人。而制造金质奖章的钱，资本家却要工人从菲薄工资中“捐献”出百分之五，不肯自掏腰包。

脂粉掩盖不了他们的狰狞面目

三友实业社资本家还经常自称为股东的“经理人”，不过是“公仆”和“职工领袖”，“与职工在同一方面”，而且“处处为工友着想”，“种种设施，均有利于工友，两方互相扶助共谋胜利”。这又是宣传劳资合作，模糊劳资阶级界线的一套鬼话，其实他们对付工人的手段是十分狠毒的。

他们知道工人组织起来就有力量，是他们施行剥削压迫最大的障碍，所以他们最痛恨工会组织。通过“五四”运动以及后来的多次爱国反帝运动，三友实业社工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组织起来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们曾经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，也有有力地揭发了资本家对职工的残酷压榨，提出将工资、劳动时间作合理调整的要求。资本家眼看当时革命形势高涨，工会惹不得，虽然恨得咬牙切齿，表面上还装出一副“可以商量”的姿态。没有几时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，上海发

生“四·一二”大慘案，一時烏雲蔽天，白色恐怖弥漫，資本家見時機已到，就投靠了反動派，馬上向殺人魔窟偽上海警備司令部聯繫，還親自向反動派提供黑名單。三友實業社的三位工會領導人，就此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。其中有的從此不知下落，有的出獄後也病死。

受到大革命影響，已經覺悟起來的三友實業社職工，決沒有被吓倒。那裏有剝削和壓迫，那裏就一定會有反抗。大革命失敗後，職工仍舊不斷地進行鬥爭。資本家用盡一切手段，象指派狗腿子辦黃色工會，利用地域觀念分化工人團結，實行“互助板”制度，使職工之間互相監督思想言行，以補資本家耳目的不足等等，都不見有多大“效驗”。那時，三友實業社已盤下杭州通益公紡織廠作為三友杭廠，那裏工人工資低，工人組織程度不及上海。資本家於是就下了毒手，借口三友滬廠“一·二八”戰爭中受了損失，“機器損壞，無從開工”，宣布停辦，解雇全廠一千三百名職工。工人揭破資本家陰謀，堅決要求復工。在資方拒絕後，一千多工人在一九三二年四月里爆發了持續二十個月的復工鬥爭。三友實業社資本家使用種種卑劣手段，一心蠻干到底。如在一九三三年，他們為了破壞工人罷工，竟指使親信縱火燒掉引翔港的一部分廠房，而且反咬一口，說是工人放的火，企圖平息工潮和解雇工人，但他們的陰謀仍沒有得逞；最後，他們就勾結了上海流氓頭子杜月笙出來強制工人解散，在一九三三年年底，在流氓手槍威脅下，許多工人被解雇了。所謂“公仆”，所謂“處處為工友着想”的假面具都撕破了，露出了猙獰的面目。但是三友滬廠工人的復

工斗争仍然不断地在进行。抗战胜利后，工人的复工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。

*

*

*

解放后，三友实业社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伟大的“五反”运动打退了资本家的猖狂进攻，一九五四年政府批准了该社实行公私合营。

职工群众翻了身，成为企业的主人，不少职工担任了厂里的领导工作。职工积极性充分发挥，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，从织造车间来说，一九六三年的生产水平比解放初已提高五、六倍，合营初正品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，现在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。职工生活也有很大改善，除此以外，“生病有劳保”“退休有养老”，还有各种福利，全厂的劳保费、养老金、福利费每年开支达十多万元。职工们被剥削、被压迫的悲惨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他们痛恨资本主义的剥削，热爱社会主义。他们正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）

“米蛀虫”的花招

解放前，泰山米店老板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米商。那时上海人民都罵他是条“米蛀虫”。

这个老板在一九三七年泰山米店开张之前，勾結了一个姓周的大汉奸，弄来了一笔肮脏錢，作为开店資本。为了便于进行剝削，他勾結了反动派做后台。在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上海时期，他拜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做老头子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和国民党的警察局搭上关系，作为自己的靠山。他还和当时的粮食部门串通一气，依仗权势，囤积居奇，投机买卖，操纵市场。就这样，泰山米店的老板靠着剝削广大劳动人民，和残酷地压榨职工，在短短的十余年中，从一九三七年开店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，发展为“三山”（即泰山、衡山、华山）和“二昌”（新五昌和老五昌）五片米店，还開設了两片米厂和两片米行，存有大米数千石，成为旧上海赫赫有名的“米蛀虫”。

盘剥农民

泰山米店在一九三七年开张后不久就賺了不少錢，但老板并不滿足，他又在青浦产米地区開設了米店、米行和米厂，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盘剥。他經常用剋扣斤两、杀价收粮等手

法掠夺农民的劳动果实。平时，老板看到农民一清早肩挑或者用小船装运五斗、一石米，到青浦城镇上来出售时，他知道这些农民急于要钱用，就大肆杀价。有时，他为了逼使农民降低价格出售粮食，故意推说没有现款，不收购。农民们本想早点卖掉粮食早点回家，没料到老板会来这一招，不卖吧，在城镇上多耽擱一天半天，就要多花钱，卖吧，价格实在太低，想想又舍不得。有的农民想直接拿到上海来卖，但一算，往返的车资增加了，到了上海也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，因此，明知吃亏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卖给他。有天近黄昏的时候，有位中年农民，掬着五斗米来到青浦泰山米店出售，老板知道这个农民急于把米出售后回家，便推说没有现款，不收购。接着又换了一副嘴脸，假慈悲地说：“天快夜了，你又要钱用，看在老户头面上，就收下吧。”老板随手付了现钱。这个农民接过钱一数，比市场上规定的价格明少了一成。这个农民因急于用钱，只得忍痛把米卖给老板。

一到粮食登场的时候，老板对农民的剥削更为厉害。泰山米店老板凭着他上海有“脚”，市场米价涨落情况知道得早，当他得知上海市场到货不多、纳胃大（要米的人多）、价格上涨，便假装好心肠似地把收购价格每担提高一两角钱。农民不知道上海粮价已涨了好几成，还以为泰山米店老板发“善心”，纷纷把米卖给他。老板趁机大量收购，有时一天收购的大米在三四百担以上，连夜用大卡车运到上海，就这样一转眼工夫，赚了大钱。

那时，老板还专门派了几个亲信，经常往来松江、常熟、苏